

当代中国发展论丛



第 2 辑

State and Civil Society

A Chinese Perspective

国家与市民社会：中国视角

邓正来 主编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当代中国发展论丛



第 2 辑

State and Civil Society

A Chinese Perspective

国家与市民社会：中国视角

邓正来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家与市民社会:中国视角/邓正来主编. —上海:
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当代中国发展论丛)

ISBN 978 - 7 - 5432 - 1885 - 7

I. ①国... II. ①邓... III. ①市民—城市社会学—研究—中国 IV. ①C912.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34961 号

责任编辑 顾悦
美术编辑 路静

当代中国发展论丛(第2辑)

国家与市民社会:中国视角

邓正来 主编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格致出版社
www.ewen.cc www.hibooks.cn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24层)



编辑部热线 021 - 63914988

市场部热线 021 - 63914081

发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刷 上海图宇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635 × 965 毫米 1/16
印张 19.25
插页 2
字数 256,000
版次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432 - 1885 - 7/F · 370
定价 45.00 元

学术编辑委员会

顾问 王仲伟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秦绍德 (复旦大学)

主任 潘世伟 (上海市委宣传部)

副主任 邓正来 (复旦大学)
陈 昕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学术编辑委员 (按首字音序排列)

陈嘉明 (厦门大学)
陈嘉映 (首都师范大学)
陈思和 (复旦大学)
樊 纲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
方流芳 (中国政法大学)
高 毅 (北京大学)
郭齐勇 (武汉大学)
何怀宏 (北京大学)
何勤华 (华东政法大学)
胡景北 (同济大学)
姜义华 (复旦大学)
李 强 (清华大学)
林尚立 (复旦大学)
刘 康 (上海交通大学)
刘清平 (复旦大学)
刘世军 (上海市委宣传部)
马 敏 (华中师范大学)
毛寿龙 (中国人民大学)
秦 晖 (清华大学)
秦亚青 (外交学院)
桑玉成 (复旦大学)
沈丁立 (复旦大学)

沈志华 (华东师范大学)
史晋川 (浙江大学)
时殷弘 (中国人民大学)
孙立平 (清华大学)
孙周兴 (同济大学)
童世骏 (上海社会科学院)
汪 晖 (清华大学)
王岳川 (北京大学)
韦 森 (复旦大学)
许纪霖 (华东师范大学)
徐显明 (山东大学)
徐 勇 (华中师范大学)
许章润 (清华大学)
杨念群 (中国人民大学)
姚 洋 (北京大学)
俞可平 (中央编译局)
张 军 (复旦大学)
张曙光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
张维迎 (北京大学)
张文显 (吉林大学)
张小劲 (清华大学)
周国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

倾听来自中国的解读

潘世伟

本丛书命名很是朴实和一般——“当代中国发展论丛”。究其含义，大致有三重意思：一是中国属发展中国家。近现代以来，由于外部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内部封建主义的腐朽，致使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滞后，长期处于不发达的状态之中，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二是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因为在种种内外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中国没有沿袭传统资本主义的进化道路，而是选择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这是人民的选择，也是历史的选择。然而社会主义道路毕竟是一种初创的实践，其目标确定、制度设计、成长路径和运行机制都有着很大的不确定性，无疑会体现出发展中的特征。三是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中性质。就对中国现代化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把握而言，中国社会科学只能在不断探索和试错的过程中深化，只能在不断思考和总结的过程中成熟。就精神生产自身运动而言，中国社会科学有待于在对西方学术的学习中，在对传统中国文化的承继中，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中，逐步寻找三者融会贯通的整合路径。基于以上三个方面的考虑，用发展中的中国来描述和界定当代中国，显然是一个比较贴切和准确的解读。

引起人们兴趣的是，近30多年来，中国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中国的变革力度越来越大，中国的现代化成就也越来越明显。中国犹如一个巨大的实验室，其发展展现为一个集经济增长、政治稳定、社会发育、文化成长、外交活跃于一体的全面变革过程。在经济方面，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以年均9%以上的增幅持续增长，经济总量跨越式地居于世界第二，在世界贸易体系中成为工业产品的重要供应者。在政治方面，这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国家始终保持了可贵的稳定，民主实践得到坚定不移的推进，法制治理得到坚持不懈的贯彻，政党领导得到卓有成效的改进。在社会方面，民生问题始终被置于议事日程的首位，社会公平正义的追求从未被放弃，发展的社会代价努力地被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社会保障体系在积累中不断完善，各类公益性民间组织蓬勃兴起。在文化方面，主流意识形态的构建和创新持续进行，人们的思想面貌和精神世界在深刻变化中展现越来越多的健康要素，公共文化产品的供应日益丰富，教育、文艺、科技的普及程度大大提高。在对外关系方面，中国一以贯之地坚持开放的立场，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谨慎处理大国间关系、周边国家关系，积极参与全球事务，努力在国际政治格局调整和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中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所有这些事实表明，中国的发展是一个典型的案例，无论是发展的全面性，或者是持续性，还是发展的深刻性，都是当今世界所少有的。因此，发展中的中国引起了越来越多人士的好感和好奇，也就是一件自然的事情了。

通过中国快速发展的现象，人们不免要作进一步的深入思考，一系列的困惑也会随之而来。中国的发展只是若干偶然因素作用的结果吗，还是其中蕴含着某种客观的必然性及历史的合理性？中国的发展只是一个孤立的个案而无法仿效吗，还是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有着普世的借鉴作用？中国的发展只是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的简单复制吗，还是吸取市场经济等人类文明成果并结合自身国情的独特创造？中国的发展只是一连串仓促忙乱却有成就的实际行动吗，还是会逐渐形成一个具有示范意义的发展模式？中国的发展只是一场脉冲式突进吗，还是会在现有的

动力推动下赢得一个长周期的持续进步？中国的发展只是物质的丰富、利益的追求和经济的增长吗，还是体现了中国人独特的发展观、秩序观、幸福观和世界观？凡此种种问题，都是客观看待中国发展的人们所无法回避的严肃挑战。倘若要准确地回应上述问题，凭借人们的生活常识是无法胜任的，这就需求助于人文社会科学的智力支持。活跃在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各个学科领域的学者们，应当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令人欣慰的是，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没有缺席这场伟大而深刻的变革，也没有迷失于这次剧烈而急速的转型，他们与时代同进，与实践同行。近年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工作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对现实世情、国情的深入分析。不论是改革开放艰难启动之际，还是其后每个具体发展阶段和具体改革领域，中国学者都非常注重当时外部国际环境和自身现实状况的分析，以求梳理出阶段性的或领域性的主要矛盾。在问题意识引导下，使发展进程中的瓶颈凸显在人们面前，从而为改革开放的决策者提供充分的信息和素材。

其二，改革路径和方案的专业设计。虽然中国改革开放的轻重缓急有自己的节奏，也有自己的程序，但谁也不能否认它的广泛性和全面性。从经济领域到政治领域，从文化领域到社会领域，先后经历了大大小小成百上千项重要变革，这些改革的存活率、成功率异常之高。其重要原因在于有深思熟虑的周详预案，而中国学者为之付出了辛勤的智力劳动。在几乎每个有待推出的方案中，都有改革必要性紧迫性、总体目标任务、具体工作重点、保障条件和注意事项等方面的详尽构思和设计。正是这些前置的努力，使得中国的改革区别于当年苏联东欧的改革，较少仓促、随意、粗疏，而更多客观、细密、从容。

其三，国外先进经验的引入与借鉴。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开放的中国与世界的交流、交融、交锋日趋紧密频繁。中国学者是两者之间互动的纽带。这是一个对世界潮流、基本趋势以及有益要素最为敏感的群

体。近年来，中国学者孜孜不倦地介绍和推介来自外部世界的前沿信息、新鲜理念和先进经验，因而使中国各个阶层的人们开阔视野、知识更新，获益良多。

其四，有序讨论的倡导。当前中国社会构成、利益关系的多样化已是一个客观基本存在，同时，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又决定了人们根本利益的一致，没有对立性质的冲突，也是一个客观基本存在。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并取得预期成效，有赖于各种意见的充分表达，取决于各方利益的有效协调。所以，日益丰富的公共讨论，逐渐成为改革开放成败与否的一个重要条件。中国学者在这方面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他们围绕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问题，推动或参与大大小小的讨论。这些讨论大多在学术层面展开，有时也会具有较强的社会性和公众性。这些讨论往往反映了不同角度的看法，或不同人群的诉求，使人们对某项具体改革的思考更加全面。这些讨论提供了解决实际问题的多种思维，拓展了实际行动的更大空间，也提高了人们比较和选择的能力。更重要的是，这些讨论有助于整个社会在活跃的氛围中逐步达成共识，集聚人心，采取一致的行动。

其五，改革和发展成果的评估和总结。这是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十分重视的又一个关键环节。众所周知，中国的实践具有艰巨性的特点，因为在一个人口最多的国家实现现代化，其难度远甚于其他国家。中国的实践也具有探索性的特点，因为在一个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意识形态主导的国家，要完成与市场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对接，毫无现成的经验可以参照。中国的实践还具有长期性的特点，因为在一个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基础上，真正完成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和国际化的目标，将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所以，中国必须善于总结，勇于自我评估，勤于反复检验，敢于不断纠错。中国学者在这方面再次发挥了重大作用，他们热情地开展了各种各样的总结，既有学理性的论证，也有社会意义强烈的评估；既有学术界独自进行的思辨型回顾总结，也有与执政党和政府合作开展的经验型回顾总结。这些活动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改革开放决

策者和行动者的不断成长、成熟,同样有力地保证了改革开放后续行动的准确性和有序性。

其六,大众理性的普及与弘扬。中国的改革开放是造福于人民群众的,也是亿万人民群众共同参与的伟大实践,具有自我教育、自我管理的特征。通过改革开放,人民群众不但要求获得物质利益,拥有丰裕的美好生活,也要获得政治和精神的成长,拥有更加文明的精神境界。因此,中国的知识分子有责任传播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弘扬大众理性,创造共同的精神家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与此同时,大众理性的普及,也能为人民群众处理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提供基本准则,有助于社会关系的调节,社会矛盾的纾解。为此,中国学者以多种方式开展了大众理性的普及与弘扬工作,为紧张急促推进的改革开放进程注入了可贵的润滑剂,不断提升着转型社会的和谐程度。

其七,人文社会科学自身建设的加强。现代意义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艰难起始并曲折发展于20世纪。然而,真正的繁荣发展还是得益于改革开放时期。改革开放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创造了难得的发展机遇,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焕发了与时俱进的勃勃生机,中国传统文化资源被人们以新的眼光重新梳理和传承,世界优秀文明成果史无前例地得到重视和引进,各类思想资源的集聚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大发展奠定了丰厚的基础。更关键的是,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实践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素材,全面推进、不断深化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打开了巨大的发展空间。这就使得中国学者在参与实践的同时,十分自觉地致力于人文社会科学的自身构建。于是,我们高兴地看到,学术与社会、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不断深入展开,具有中国风格的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构建也逐渐成形。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是与党和政府的理解、重视和支持分不开的。党和政府殷切地期望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能够发挥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大作用。如果说,改革开放启动之际,基于生产力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急迫需要,

中国的党和政府极为重视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那么，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化，随着继经济建设之后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先后被提上议事日程，中国的党和政府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关注日益加强。由此而明确提出了“四个同等重要”的重要理念，即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培养高水平的哲学社会科学家与培养高水平的自然科学家同样重要；提高全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素质与提高全民族的自然科学素质同样重要；任用好的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与任用好的自然科学人才并发挥好他们的作用同样重要。根据这一方针，中国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来推动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将其作为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真切地期待人文社会科学的春天能够早日来临。

由于中国的党和政府与学术界的共同努力，使得在改革开放的 30 余年里，理论研究对实践推进产生了重要影响。当年改革开放之舟的起锚远航，即始于自理论界的一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大讨论，并由此引发了挣脱教条主义桎梏的思想解放运动。而当 30 年发展周期总结之际，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构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一场历史性变革在长达 30 年的时间里保持着对理论指导的热切期盼，没有一个政党如此卓有成效地把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不变忠诚与对主流理论的创新有机结合起来，没有一个国家始终延续着对理论的偏好与热忱。理论的作用，成为观察和研究中国改革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从某种角度也可以作出这样的归纳：理论决定了实践，实践改变了中国，中国影响了世界。

当然，翻天覆地的改革开放实践也反过来影响和改变着理论本身的发展。在过去 30 余年的时间里，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走着一条不完全相同于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仔细地观察，可以发现其成长过程的三个特点：第一，从发展路径看，努力探索并初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原理、人类文明成果与中国现实国情的三者结合。第二，从基本内容看，努力推动并初步实现了理论探索、知识普及与政策转化的三者结合。第三，

从参与主体看,有效倡导并初步实现了专家学者、领导干部与社会公众的三者结合。当然在以上三个方面的结合过程中,人们经历了从不系统到系统、从不熟练到熟练、从不自觉到自觉的变化。这些努力的结果,是使当前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站到了一个崭新的起点之上。我们这套丛书的目的,就是把过去 30 余年里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和成果,以及它与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密切关联,介绍给国外学术界及社会公众。

当然,我们冷静地看到,尽管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依然有着许多不足。比如,对中国经验、中国模式的研究有待深入,对学术的规范发展需要给予更多重视,各学科的发展尚不均衡,研究方法、分析方法的多样化、科学化还做得不够,学者队伍的培养仍需加大力度。其中,尤为薄弱的一个环节便是国际化的水平不高。统计数据表明,1991 年至 2001 年的 10 年里,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应邀出国讲学 9 000 人次,出国进修学习 1.9 万人次,聘请外国学者来华讲学 2.3 万人次。2001 年至 2005 年间则有了更大发展,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10 万多人次,在国外期刊发表论文 1.3 万篇,与国外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合作项目 2 600 多个。显然,中国学术与世界学术的互动交流呈现稳步增长的态势。然而,国际学术交流中“输入”大于“输出”的逆差现象却十分严重。以学术翻译为例,2000 年至 2005 年,大约有 7 000 多部外国学术著作被译成中文,但同期却只有不到 800 部以中国学者为第一作者署名的学术著作被译成外文。再以国际上极为通行的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中收录的学术期刊为例,2007 年度 SSCI 收录了 1 962 种由 40 多个国家出版的期刊,其中美国占了将近 60%,前十位国家占了 90%以上,而涉及中国社会科学类的期刊仅 10 种左右,真正由中国主办的只有一种期刊,即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主办,由英国布莱克维尔出版公司出版的《中国与世界经济》(*China & World Economy*)。中国学术无法走出去的局面,与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影响和政治影响是不相称的,也是中国人文社会科

学发展进程中的一个缺憾。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真正落实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走出去”战略，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决定启动“当代中国发展论丛”重大项目，组织了专门的编委会，并委托复旦大学特聘教授、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邓正来教授主持该项目。该项目拟通过翻译中国学人在近30年发表的关于中国发展经验的优秀学术论文，向国际学术界系统而全面地译介和推荐中国学者具有国际学术水平的优秀学术成果，以求迈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走向世界的坚实步伐。

具体而言，该系列丛书具有如下特点：第一，坚持“立足中国、走向世界”的原则，根据国际学术需求，确定具有国际学术影响力的主题。我们认为，只有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人文社会科学才能真正走向世界，只有具有鲜明民族和文化烙印的人文社会科学才有真正的生命力。本着这一原则，我们选择了若干可能具有国际学术影响力的学术研究领域作为切入点，形成了诸如“中国经济：农村改革与农业发展”、“国家与市民社会：中国视角”、“中国与美国关系：中国视角”和“全球化与地方化：中国视角”等主题。第二，组织权威性的学术编辑委员会，坚持严格的学术标准，遴选相关主题的最优秀的学术论文，由吴敬琏、俞可平、张维迎、汪晖、陈嘉映、周国平、邓晓芒、陈平原、陈来、朱维铮、孙立平等中国著名学者组成的委员会，体现了较高的学术权威性，并以严谨的态度进行公正客观的遴选。

中国学术走向世界是一个崇高的目标，也是一项艰巨的使命，更是一个长远的过程。将持续激励我们投身这项工作的动力，是基于这样一个坚定的信念：中国已经发生、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经济社会发展，以及相关的学术发展，在根本上与人类文明发展的走向是相一致和相协调的。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我们这种严谨、平实的不懈努力，我们一定能为解读中国变革、总结中国经验、研究中国模式、传播中国价值并提升中国人文科学国际化水平作出我们的微薄贡献。我们希望世界各地的读者能给予批判性的审视。

序言：“知识转型”时代的中国研究

邓正来(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

20世纪80年代以降,尤其是因冷战的结束和铁幕的消失而导致的意识形态之战的结束,“全球化”逐渐从两个向度上凸显出来。第一个向度表现为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向市场经济转型,使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国际经济一体化和国家间相互依赖的趋势更加明显,并且在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三驾马车的支配下,以及因全球性问题的增加或人类共同危机的出现而表现出更多全球性或更少民族国家的色彩。一如罗伯特·赖克所指出的那样:“我们正经历一场变革。这场变革将重新安排新世纪的政治与经济。届时将不存在国家的产品或技术,不再有国家的公司、工业乃至国内经济等等这些为我们熟知的旧概念。国家的边界以内将只剩下组成这个国家的人民。……而全球经济的离心力正试图拆散把一国的公民们联系在一起的纽带。”^[1]实际上,每一个国家和全世界几十亿人民的生活,都正蒙受全球化所带来的相当剧烈的改变,而其影响的程度和意义,几乎是无所不在的。

第二个向度则表现为当代全球化问题的研究逐渐成了各个学科的“显学”: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罗马俱乐部”发表关于全球问题的研究报告^[2]以后,一方面,“全球化”一词^[3]渐渐成了国际社会科

学界使用频率最高的概念之一，进而成为人们审视当下各种问题的新视角，甚至构成了人们知识生活的真正“语境”。正如 M. 沃特斯所指出的，“就像后现代主义是 20 世纪 80 年代的概念一样，全球化是 20 世纪 90 年代的概念，是我们赖以理解人类社会向第三个千年过渡的关键概念”^[4]。关于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指出的是，“全球化”也是内涵界定分歧最大的概念之一，“但是无论人们如何评价全球化，涉及的都是这样一种强势理论：以领土来界定的社会领域的时代形象，曾在长达两个世纪的时间里，在各个方面吸引并鼓舞了政治、社会和科学的想象力，如今这种时代形象正在走向解体。伴随全球资本主义的是一种文化与政治的全球化过程，它导致人们熟悉的自我形象和世界图景所依据的领土社会化和文化知识的制度原则瓦解”^[5]。

另一方面，关于“全球化”的学术研究也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科学各个研究领域的一项核心论题，因为不仅当今世界的一切重大经济、政治、社会、法律和文化问题都与全球化这个论题紧密相关，而且当下在各种学术刊物上出现的以“全球化”为论题的研究（诸如全球治理研究、经济全球化研究、文化全球化研究、全球共同利益研究、全球正义研究、政治全球化研究和法律全球化研究等等）几乎也已覆盖了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6]

显然，就中国和中国社会科学而言，全球化给我们至少带来了如下亟须回答的问题：我们究竟应当如何认识全球化进程？它究竟是客观必然的进程，还是主观可变的进程？全球化究竟是一种事实，还是一种话语建构的过程？对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全球化究竟带来了怎样的挑战和机遇？对中国社会科学而言，全球化又意味着什么？等等。

一、“世界结构”与“主体性中国”：

一种“根据中国”的全球化观

我们究竟应当如何认识全球化及其给中国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呢？

在我看来,只有厘清如下几个问题,我们才能对此问题给出令人满意的回答:我们究竟是如何被裹挟进全球化进程的?我们究竟该如何认识全球化的性质?中国当下所处的全球化进程与此前的历史时期有何不同?在全球化时代所形成的世界结构中,中国究竟处于何种位置?已有的全球化话语及相关的理论话语是否足以解决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在晚近以来的研究中,我本人一直以我所谓的“世界结构”或“全球结构”为概念工具来回答与全球化有关的上述问题。考虑到本文的篇幅和论旨,在此不妨将我的观点予以概述。

概言之,我的相关论说可归结为如下几个相关的命题^[7]:

第一,中国因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而加入到全球化进程之中,但是当下全球化的世界却蕴含着结构性的不平等,亦即形成了一种我所谓的“世界结构”。伴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以及中国对世界的开放,尤其是在中国因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而进入世界体系以后,我们所关注的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孤立的中国,而是一个世界结构中的中国。对于中国来说,这才是3 000年未有之真正的大变局。此前的中国,作为独立的主权国家,虽说也因位于地球之上而与其他国家交往或冲突,但是却从未真正地进入世界的结构之中——这意味着中国虽在世界之中,却在世界结构之外,是“世界游戏”的局外人。我之所以将中国所参与的“世界游戏”标识为“世界结构”,是因为它是有“中心”和“边缘”之分的,它蕴含着发达国家对后发国家的结构性支配。正如罗伯特·W. 迈克杰斯尼所言:“之所以出现市场的全球化,是因为那些发达国家的政府,特别是美国政府,将种种贸易合约和协定强加到世界人民的头上,使得那些大型公司和富商们能够轻而易举地主宰其他国家的经济命脉,却无需为那些国家的人民承担任何责任。”^[8]在我看来,发达国家对后发国家的强制性支配关系,不仅表现于迈克杰斯尼所关注的经济层面,亦即世界结构在允诺因市场经济体制而使生产资料在全球达成优化组合的同时,致使中国处于一种日趋“依附”西方的边缘化地位,而且还表现在下述两个方面:一是在规则制度层面。众所周知,在

一些颇具影响的领域当中，那些经中国承认的所谓世界结构既有的法律规则或制度，实际上乃是一些西方国家的地方性知识；而正是通过这些法律规则或制度而传入的某些价值，也在支配关系的逻辑中转换成了无需讨论的单一性和终极性的标准。二是在一般的文化层面。因意识形态的消解，科技的发展与文化确实发生了高度的整合，但是在当下世界结构的支配关系中，正是那些作为“支配者”的西方诸国的文化正伴随着科技的出口而出口，而那些作为“被支配者”的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文化则在不断地被压缩、被压制和被抽空化。

第二，与此前的现代化时期不同，西方国家在全球化时代对中国进行支配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亦即形成了一种基于承诺、而非基于“共谋”的支配。在现代化时期，由世界结构生成的“现代化范式”对中国的发展有着很强的支配作用，但其间最为重要的、也是中国学者普遍忽视的是（亦即中国学者集体无意识的具体展现），中国知识分子在这种“支配”过程中与“支配者”的共谋，亦即中国论者对西方“现代化范式”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无批判意识或无反思性的“接受”。显而易见，就这种支配而言，此前世界结构对中国支配的实效乃在于受影响的中国与它的“共谋”。据此我们可以说，这种支配乃是非结构性的和非强制性的——西方的“现代化范式”对于中国来说只具有一种示范性的意义，因为只要中国不与它进行“共谋”，那么西方“现代化范式”就无力强制中国按照其规则行事并根据它进行未来的想象。但在后冷战时代，世界结构支配的实效所依靠的却是被纳入这场“世界游戏”的中国对其所提供的规则或制度安排的承认。据此，我们可以说，当下世界结构的支配是结构性的或强制性的，这种强制性所依靠的并不是赤裸裸的暴力，而是中国就遵守当下世界结构所提供的规则或制度安排所做的承诺，而不论中国是否与之进行“共谋”。由此可见，中国在全球化时代所参与其间的这种世界结构，对中国的未来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有着一种并非依赖“共谋”而根据承诺的“强制性”支配。

第三，国际法上传统的“主权平等”原则并不能拯救中国，我们必须

从“主权的中国”迈向“主体性的中国”。对世界结构中支配关系之不平等性质的揭示对后发国家极为重要,因为它凸显了这种不平等的支配关系与16世纪以降西方论者所宣称的主权国家“平等”之事实之间所存在的高度紧张。根据前述的支配关系,当下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也被认为是一个“新帝国”时代。当然,这个“新帝国”时代所主要依靠的不再是军事战争和鲜血,而是信息、知识、资本和市场;更为紧要的是,“新帝国”或其他支配者在这个时代的目的,在很大的程度上也不只是为了在世界中扩张和维护各自的民族利益,而是为了在世界中把各自民族认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或理想图景当做物品加以推行,并通过推行这些民族价值或理想图景而将相关的社会秩序或政治秩序强加给其他的国家。因此,在当下的世界结构中,除了能够在对外方面为捍卫自己的领土完整、国家安全、保护人权和经济发展提供最正当的理据以外,所谓“平等”的主权,亦即主权的中国,不仅不是充分的,而且还有着相当的限度。世界结构中的“中国”的实质不在于个性或与西方国家的不同,而在于主体性,在于中国本身思想上的主体性,其核心在于形成一种立足于中国的中国观和世界观(亦即一种二者不分的世界结构下的中国观),并根据这种中国观以一种主动的姿态参与世界结构的重构进程。在当下的世界结构中,从强调“主权的中国”到强调“主体性的中国”的转换,根本的要旨便在于突破主权的限度,走向世界结构层面的“主体间性”、“文化间性”或“文明间性”,而这在更深的层面上,则意味着不再是某些主权国家决定世界结构的规则或合法性,而是主体间性与世界结构的规则或合法性在交往和商谈中一起生成演化。

第四,无论是从全球化本身的性质还是从西方国家在全球化时代对中国实行支配的性质来看,当下如火如荼的全球化进程对中国构成挑战的同时,也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因为只要我们建构起中国自己的“理想图景”,我们就可以将参与修改世界结构之规则的资格转化为修改世界结构之规则的能力,并基于中国立场型构和影响全球化的进程和方向。全球化不仅是“经济主义”论者所主张的经济全球化过程,而是一个